

新版《新华字典》将上市 未收录“神马”等热词

本报讯 《新华字典》此次修订没有收录“童鞋”、“神马”等网络热词。记者了解到，这次修订最让大家关注的是网络热词是否被收录。

在日前《北京图书信息报》主办的“书香茶座”上，第十版《新华字典》修订负责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介绍，本次修订“含金量”上升，涉及面广，是修订而非新编，要有学术性，而不能学术化，确保一般读者看得懂。

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人们赋予了一些词新的含义。比如“绿”字，它一开始是指颜色，后来增加了一个含义，如“绿色产品”，指无公害、无污染产品。今年又增加了一个含义，如“绿色通道”，指便捷快速的通道。

“但是‘童鞋’、‘神马’等网络热词并没有收录。”针对目前十分流行的网络热词，于殿利表示，新版的《新华字典》不会收录这些词。

于殿利同时表示，对于流行的网络热词，可以收录进一年一更新的《新词语词典》或者《网络语言词典》。而《新华字典》具有引导规范和标准的意义，而网络热词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调侃，在一定时期内缺乏稳定性。

(钟新)

链接：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用白话注释和举例的小型汉语语文辞书，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它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晓文)

南京明代“锦衣卫”墓内稀世梅瓶将对外展出

本报讯 南京市博物馆22日发布消息：近日该馆在南京林业大学新庄校区一处工地发掘了明代南京锦衣卫指挥金事徐氏墓葬内出土了稀世蓝釉梅瓶，该宝将于近期在博物院《玉堂佳器》展厅内展出，让大众一睹其“美貌”。

此“宝物”是不久前该馆考古人员在南京新近发现的一处明代“锦衣卫”墓室内发现的。考古人员在墓穴的壁龛里不仅找到了两对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合字墓碑，同时还惊现一对珍贵陶器：一只白色陶罐古朴简单，高约20厘米；另外一只蓝色梅瓶则惊艳全场，高约30厘米，身形秀美，通体蓝色泽油润鲜艳。

据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周道祥介绍，现在发现的梅瓶大部分都从王公大臣的墓穴内挖出，相当稀少：古代烧制梅瓶的原料都要从西亚进口，在当时，这种原料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而蓝釉对陶器的烧造技术要求特别高，所以蓝釉梅瓶是极为珍贵的稀罕之物。

据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墓志上刻的“南京锦衣卫指挥金事徐君叙妻恭人周氏之墓”，可以推断这座古墓的男主人徐叙是明代位列四品的锦衣卫。

(钟新)

收藏市场水太深——

卖假不退货 拍卖不保真

本报讯 存银行利息低、炒股票怕大跌，还是投资艺术品靠谱——时下，不少手里有些闲钱的市民渐生此类想法，于是到老街淘宝、到拍实行竞拍、与朋友交易，通过各种途径投身收藏。记者获悉，近两年来涉及艺术品收藏的诉讼越来越多，入手赝品的市民将卖主或中介方告上法庭，却往往打不赢官司。

王先生从一家古玩商店买回2件古玩：价值37万元的“五彩三娘教子图盘”和价值8万元的“青花缠枝花卉大觚”。过了半年，他把古玩拿到市文联艺术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这件器物属“高仿精仿产品”。他多次与古玩商店交涉退赔，均遭到推诿，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退还45万元。还有一名收藏家苏先生，花费253万元拍下一幅名家油画，经画家本人鉴定作品是假的。苏先生拿着画家的亲笔证明，将卖主推上被告席。但两位收藏者最终都没打赢官司。

藏品属赝品已成不争事实，为何还是打不赢官司？法官解释说，古玩交易买卖是投资回报高、风险也大的一种特殊行业，在长期“交易实践”中形成一套特

有运作模式，收藏者从看货到支付价款间有一段时间，应从收藏品本身有鉴别能力。而从买卖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来看，消费者已认可拍卖行和古玩商店出具的“不保真”免责条款，且合同中对收藏品的描述与实物相符。

收藏艺术品的另一途径，则是“圈内人”之间的私下交易，在法官看来，这种交易也颇具风险。美籍华人赵先生是朋友圈里小有名气的收藏爱好者，一次，他花9000美元买下朋友的祖传“清代康熙年釉彩水盂”。他请来鉴定机构对古董材质进行鉴定，确认成分“没有问题”。后来，其他一些圈内人士将其鉴定为赝品。赵先生遂将卖主告上法庭。法院最终没有支持赵先生的诉讼，请原因是鉴定机构仅对艺术品成分进行检测，并没有对其制造年代作出认定，买卖双方根据实物及鉴定报告进行交易，并不存在欺诈情况。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艺术品收藏市场存在着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市场交易中已形成类似“卖假不退”、“拍卖不保真”、“古玩不打假”等所谓“行规”。究其原因，是我国古玩市场开禁多年



玩收藏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资料图片)

后，相应的收藏法、鉴定法和行政法规缺失，现行法律也很难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建议收藏爱好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购买收藏品

前多学习相关知识、咨询法律界人士，无论与商家还是与个人交易，最好都请鉴定机构出具证明，并做出详细合同约定，将风险降到最低。

(来源：解放日报)

“世界读书日”文化名人聚羊城

热议现代人如何实现“悦读”

据新华社广州4月23日电 (记者陈冀 黄浩苑) 哲学家周国平66岁的年纪却保持着40岁的样貌，引得羊城读者纷纷询问其“养生秘方”。周国平笑答：读书是最好的养生秘方。

伴随着又一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周国平、梁衡、毕淑敏等大家齐聚羊城，与读者一块分享快乐阅读的经历。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人平均每天的读书时间为1至3小时。与旅游相比，阅读成为广州人快乐生活的第一选择。对于广州人越来越浓郁的阅读习惯，毕淑敏称赞不已。

但是，毕淑敏对1至3小时的阅读时间提出质疑。她说：“上网浏览新闻、看股票都不能算是阅读，阅读应该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是一种与灵魂的对话，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这就像广州人的美食不是在快餐中能品味出来的。”

由于科技进步，数字出版和电子化阅读越来越盛行，冲击着传统的阅读模式。周国平、王树增等作家都认为，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学习无法取代油墨书香带来的阅读美感，希望青年一代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经典作品的文辞与匠心。

对于大师们对数字化阅读的意见，一位年轻的读者反驳说，电子阅读和翻动书页虽然手指的动作不同，但是带来的幸福感却各有所长。对此，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表示赞同。她认为，数字化阅读使年青一代养成了新的阅读习惯，他们花费更少，但却让阅读量变大、速度变快，能在快速阅读的背后品味文字背后的韵味。

作家梁衡认为，能静得下心来阅读的民族具有巨大的力量。“阅读”已经成为广州市民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悦读”也使市民素质迅速提高，生活得更有尊严、力量和幸福感。

单霁翔谈水下文物保护——

不仅要关注咸水，也要关注淡水

据新华社武汉4月23日电 (记者廖巍巍)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22日成立。出席成立揭牌仪式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此前在武汉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何有效保护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关注咸水，也要关注淡水”。

他说，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2009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以来，开始在重要的区域、地点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以期更广泛地得到当地政府和各部门的支持，为我国水下文物保护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同时，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海洋局于2010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全面进行相关合作，正在更深入地开展对水下文物资源的调查，并确保已经发现的水下文物资源的安全。

他表示，这些年，国家高度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2009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以来，开始在重要的区域、地点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以期更广泛地得到当地政府和各部门的支持，为我国水下文物保护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同时，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海洋局于2010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全面进行相关合作，正在更深入地开展对水下文物资源的调查，并确保已经发现的水下文物资源的安全。

创下多项中国考古之最 甘肃大地湾遗址启动 大规模保护和修复

据新华社兰州4月23日电 (记者张文静) 创下多项中国考古之最，拥有3000年文化连续的甘肃秦安境内大地湾遗址，日前启动了大规模保护修复工程。

记者还从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了解到，该保护项目总投资720万元，已于4月初开工，预计9月底结束。项目实施期间，遗址将暂停对外开放。

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程晓钟介绍，大地湾遗址保护项目主要包括对遗址本体的修复、通往遗址道路的修复、重要遗址如F371、F301、F405等的科技回填及复原展示等工程。

此外，项目的实施也包括对一些长期暴露在野外的遗址进行保护，加固改造通往史前宫殿式建筑F901的道路，安装遗址安防设施以及开建看护管理用房。“该项目是大地湾遗址接受保护以来最大规模、最全面的保护工程。科学保护大地湾遗址是为了让遗址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程晓钟说。

大地湾遗址由甘肃省文物部门于1958年首次发现，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共发掘240座房屋遗址、71座墓葬等遗迹。考古发掘表明，这个距今7800年至4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文字最早的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绘画以及最早的强度如“混凝土”的地面。

●/三味书屋

电子商务概论 (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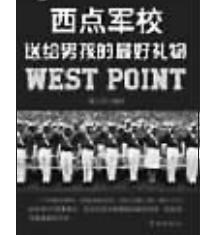


作者：李洪心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该书糅合进了近年来国内外电子商务发展各方面的最新资料。

鉴于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发生的变化，本版新增了“移动商务与移动支付”的内容(第10章)，并将“电子商务与现代服务”作为新的第12章，阐明现代服务的概念以及电子商务对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

《西点军校》



杨立军 编著
学林出版社
2011年4月

西点军校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军事院校，其影响力不仅在战场，也在培养了许多政治家、企业家。本书从多角度介绍解读了西点军校的校训：坚强勇敢的意志、责任荣誉的准则、谨慎节制的智慧、宽容谦虚的风度、团队合作的精神、吃苦耐劳的态度、理想远大的志向。

读书

书评

值班主任、主编/伍立杨 美编/林婧

2011年4月24日 星期日

●/职场新书

电子商务概论

●/艺文茶座

我们对诗歌有多少期待 ——读《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

■ 曾庆江

20世纪80年代诗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不少诗人发出“写不动了”的感慨，然后恋恋不舍地投身于其他事务中；诗歌爱好者也发出“读不动了”的叹息。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大面积兴起的今天，诗歌早已经落寞，我们对诗歌还能有多少期待呢？有人说，诗歌到今天这种状况，不是时代的悲哀，而是诗歌的悲哀。但是，《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的面世，还是让我们对诗歌产生新的期待，那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歌特征，每个时代都有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诗歌现象，诗歌从未曾远离我们。

“新红颜写作”源于2010年5月

作为诗人和诗评家的李少君和张德明的一次“海边对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对话，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轩然大波”。而这部《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正是这次“轩然大波”的阶段性总结。它将是否能够卷入更多的爱好者、诗评家，或者围绕它的争鸣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对今后的诗歌创作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家对诗歌沉寂已久的热情，却就此被再次唤醒。这是《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一书的价值所在。

“新红颜写作”是对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命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少文学命名都是对既往或者已然定型的文学现象的概

括，划定边界、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等成为其中的重要话题。而由李少君、张德明等总结出的“新红颜写作”不只是对一种创作现象的敏感把握，远远谈不上深刻的思想、缜密的理论以及人为的边界框定，诚如毕光明教授所言：“(‘新红颜’)更重要的在于它所标示的是诗爱好者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化发现，而非令人艳羡甚至极度的概念发明。”这就使得李少君、张德明的“海边对话”一定程度上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至于“新红颜写作”具体理论的框定、创作实绩的展示、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完全可以由更多的诗歌爱好者以及文学批评家们进行相应的讨论总结，这样会来得更加审慎、更加全面、更加理性、更加

客观。因此，《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收录了相当多的诗论家关于“新红颜写作”的讨论，或者揭示其理论前提，或者指陈其内涵与外延，或者剖析其诗学意义，或者解读个案作品，或者质疑其内在的不足，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也正体现了其强烈的“争鸣性”。李少君、张德明等人敏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诗歌创作现象，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则通过众多诗论家的表述而逐步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实际上是对当下一种诗歌现象的写真。这部“写真集”虽然未能将“新红颜写作”的相关表述“一网打尽”，但是由它开启的关于诗歌的又一次讨论热潮却刚刚拉开帷幕。

一个新的名词不应当只是批评圈内的自说自话，更应当得到相关创作者的认同乃至自动归队，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共分为三辑，其一为诗学批评家们对“新红颜写作”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着力于其内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发掘。在认真总结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努力分析其中存在的某种不足，进而预测“新红颜写作”今后的发展走势，体现出批评家理论的高度以及前瞻性。其二为自我归队的代

表诗人对“新红颜写作”的认知与理解，体现了“新红颜写作”实际上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一次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表达。其三为“新红颜写作”的诗人自我诗学观的表露，虽然文字的感性成分较多，但正好对前面两部分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材料。

三部分文字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映衬，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尴尬。这种编辑策略，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来面目，告诫读者一个真实的“文学场”，因此具有为文学存史的价值。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2010年12月)

一个新的名词不应当只是批评圈内的自说自话，更应当得到相关创作者的认同乃至自动归队，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共分为三辑，其一为诗学批评家们对“新红颜写作”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着力于其内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发掘。在认真总结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努力分析其中存在的某种不足，进而预测“新红颜写作”今后的发展走势，体现出批评家理论的高度以及前瞻性。其二为自我归队的代表诗人对“新红颜写作”的认知与理解，体现了“新红颜写作”实际上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一次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表达。其三为“新红颜写作”的诗人自我诗学观的表露，虽然文字的感性成分较多，但正好对前面两部分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材料。三部分文字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映衬，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尴尬。这种编辑策略，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来面目，告诫读者一个真实的“文学场”，因此具有为文学存史的价值。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2010年12月)

一个新的名词不应当只是批评圈内的自说自话，更应当得到相关创作者的认同乃至自动归队，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共分为三辑，其一为诗学批评家们对“新红颜写作”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着力于其内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发掘。在认真总结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努力分析其中存在的某种不足，进而预测“新红颜写作”今后的发展走势，体现出批评家理论的高度以及前瞻性。其二为自我归队的代表诗人对“新红颜写作”的认知与理解，体现了“新红颜写作”实际上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一次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表达。其三为“新红颜写作”的诗人自我诗学观的表露，虽然文字的感性成分较多，但正好对前面两部分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材料。三部分文字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映衬，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尴尬。这种编辑策略，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来面目，告诫读者一个真实的“文学场”，因此具有为文学存史的价值。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2010年12月)

一个新的名词不应当只是批评圈内的自说自话，更应当得到相关创作者的认同乃至自动归队，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共分为三辑，其一为诗学批评家们对“新红颜写作”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着力于其内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发掘。在认真总结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努力分析其中存在的某种不足，进而预测“新红颜写作”今后的发展走势，体现出批评家理论的高度以及前瞻性。其二为自我归队的代表诗人对“新红颜写作”的认知与理解，体现了“新红颜写作”实际上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一次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表达。其三为“新红颜写作”的诗人自我诗学观的表露，虽然文字的感性成分较多，但正好对前面两部分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材料。三部分文字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映衬，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